簡帛研究文庫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編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

[韓]權仁瀚　[韓]金慶浩　[韓]李承律　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簡帛研究文庫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編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

[韩] 權仁瀚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 /（韓）權仁瀚，（韓）金慶浩，（韓）李承律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0
（簡帛研究文庫）
ISBN 978-7-5495-0243-1

Ⅰ. 東… Ⅱ. ①權…②金…③李… Ⅲ. 東亞—歷史—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Ⅳ. K310.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092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桂林日報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八桂路 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開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8.25 字數：15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1 000 册 定價：35.00 元

如發現印裝品質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總　序

從1901年尼雅、樓蘭簡的發現算起，簡帛的發掘與研究已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一百多年來，幾代學者篳路藍縷，終於形成了今天蔚爲壯觀的簡帛研究隊伍、機構與成果。簡帛研究不僅在中國學術界佔有重要地位，在當今國際漢學界也异軍突起，備受矚目。而隨着簡牘在韓國、日本等國的不斷發現，簡帛學的國際性特點日益顯現。

簡帛的發現並不始於近代，歷史上的諸多時期都有簡帛發現的記録。但是由於古代簡帛的發現是偶然的、零星的，其研究也僅限於釋文與年代考證，不僅簡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護，而且研究範圍也十分狹窄，其整理與研究也無持續性和規範性，因此，那時的簡帛研究還不能説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

20世紀以來簡帛發現層出不窮，其總數超過20萬枚以上，分佈地域廣闊，時間跨越戰國至魏晋各個歷史時期。近代以來的簡帛發掘與研究是在一種科學規範的指導下進行的，不僅出土簡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範圍也更加廣泛、明確，作爲一門學科的性質愈益突出。關於這門學科的命名，學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稱爲簡牘學，有的稱爲簡帛學，有的稱竹簡帛書學，有的稱爲木簡學，我們以爲還是用簡帛學較爲可取。首先這門學科是按照書寫材料的性質來命名的，盡管帛書從數量上來説不能與簡、牘相比擬，但作爲同一歷史時期書寫材料的一個重要門類不可不包括進來；其次，“簡”與“牘”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書寫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傾向，現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簡多爲木質，但我們仍稱其爲“簡”，而不稱之爲“牘”，也是習慣使然，並無不妥。（參見林劍鳴《簡牘概述》）漢代的文字肯定不是完全寫在竹簡上

的，但《漢書·藝文志》或稱“書缺簡脱”，或將“竹帛”連稱，顯然是用“簡”概括了“牘”，而將“帛”作爲與“簡”並稱的一種書寫材料。當然這樣説並不是不可將簡、牘二字連用，只不過用簡帛學來規範這門學科的名稱更妥帖，而在許多特定條件下使用“簡牘”二字，也只能表明它是簡帛學的一個分支，簡牘學應包括在簡帛學的學科範圍之内。

正如人類歷史的産生不能表明歷史學的形成一樣，簡帛的發現也並不意味着簡帛學的自然形成。簡帛學還有其自身形成與發展的規律。簡帛學産生於20世紀。20世紀簡帛學的發展以1949年爲界，大體可分爲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各約五十年。前期，從20世紀初至30年代，從事中國出土簡帛整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西方學者，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馬伯樂、孔拉第等；從羅振玉、王國維1914年撰寫《流沙墜簡》至1949年，我國國内也相繼涌現一批從事簡帛發掘與研究的學者，他們的工作揭開了中國學者科學發掘、整理、研究簡帛的序幕。如馬衡、向達、勞干、賀昌群、餘遜、陳邦福、傅振倫、陳槃、黄文弼、夏鼐等都是代表人物。他們的研究涉及敦煌、居延、羅布淖爾和樓蘭、尼雅等漢晋簡牘，並運用簡牘對漢魏政治制度、經濟生活、社會文化、歷史地理以及簡牘制度本身等各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極大地擴展了簡帛學的研究内容。需要指出的是，雖然20世紀首先從事簡帛整理的並不是中國學者，但首先運用於歷史研究並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寫出了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其成就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羅、王二人開創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使簡帛研究從一開始就沿着一條正確道路前進，意義極爲深遠。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於近代中國社會政治動盪與外敵入侵，整個學術環境十分惡劣，簡帛學也不能例外，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現的居延漢簡，不僅其照片兩次被毁，而且原簡也遠渡重洋，避難他鄉，嚴重影響了學術的研究進程。新中國成立後，簡帛研究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不僅出土簡帛數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簡帛也得到新的整理。在這後五十多年裏，老一代的學者繼續辛勤耕耘，新一代的學者不斷成長壯大，港臺地區及國外學者也給予簡帛學極大關注，簡帛學迅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崛起。

20世紀簡帛學的學科建設獲得了長足進步。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科學發掘。簡帛出土大都采用現代田野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科學發掘,擯棄了歷史上"挖寶"式的原始方式。第二,有效保護。科學家們已經研究掌握了一套針對不同質地的簡帛而采取的脱水、防乾裂等技術。第三,整理手段進步。除了傳統的利用整理者個人學識、經驗來釋讀簡帛文字方式外,還利用了紅外綫攝像與計算機模糊圖像處理技術來輔助釋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四,簡帛制度研究成就斐然。簡帛作爲記録幾個世紀歷史與文化的載體,無論在材料運用與書寫方式、形式與稱呼、編聯長短、題記與符號等若干問題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規範,學者們經過長期努力,已經揭開了其中的許多奥秘。第五,簡帛内容分類研究不斷深入。簡帛内涵十分豐富,包括古代典籍、各級官府檔案文書、法律文書、信函、契約、賬簿,等等,因此簡帛内容的分類問題向爲學者所重視,隨着研究的深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第六,簡帛研究向多學科滲透。簡帛學是一門通過對地下發掘的含有古代文字、圖畫的簡牘帛書的系統研究來補充、修正傳統文獻所記載史實的學科。簡帛學不僅可以與歷史學相結合,而且由於它包含的内容十分豐富,又可以與多種學科相結合。例如它與考古學就密不可分;隨着簡帛文字的系統整理與公佈,運用簡帛材料研究古文字、古漢語也將日益受到重視,因此簡帛學與語言學也有密切關係;簡帛中的書法、繪畫,簡帛中的科技、醫學、民俗等内容也都必須與相關學科結合研究。簡帛已突破证史、補史的單純功能,成爲諸多學科發展的生長點之一,凸顯出邊緣學科的特點。第七,簡帛研究隊伍和機構擴大,刊物增多。

20世紀簡帛學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戰國秦漢魏晋史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紀後半期,隨着新的簡帛材料不斷涌現,運用簡帛資料進行歷史研究進入到一個新時期:第一,证史。如陳直的《史記新证》、《漢書新证》中就運用了簡帛材料,戰國至魏晋歷史上許多有疑義的問題,由於簡帛資料的出土而得到部分解釋或者真相大白。第二,補史。大

量豐富細緻的簡帛材料，揭示了當時各級行政、軍事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運作的實例，爲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關於漢初法律的研究，由於張家山漢簡的公佈而大大推進。尹灣漢簡的發現使我們對漢代内郡的研究有了一個可以解剖的"麻雀"，并且邊郡和内郡的比較研究也得以展開。郭店楚簡的出土，使原本撲朔迷離的儒、道思想的原生態研究有了重大進展。簡帛在補充戰國秦漢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發揮出重要作用。第三，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如漢代文書制度研究是目前秦漢史研究中的前沿性課題之一，這一課題的形成可以説是簡帛材料出土之後的事，各種文書類型的發現使較完整地研究當時的文書制度成爲可能。其他如各種文獻的發現也爲歷史文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當前，簡帛研究正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新的簡帛還在不斷發現，數萬枚的裏耶秦簡、懸泉漢簡，十萬餘枚的三國吴簡都尚在整理之中。隨着它們的公佈，關於秦代統一以後歷史的研究、關於漢代郵傳制度的研究、關於三國孫吴歷史的研究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將會呈現出新的面貌，將是不争的事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是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設立的院屬研究中心之一，成立於 1995 年，是國内較早建立的以研究簡帛爲特色的專業研究中心之一。中心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以歷史所的研究力量爲主體，同時聯合國内外同仁共同從事簡帛學科的研究。多年來，中心本着"推進學術，加强合作，提高水平"的宗旨，在致力於簡帛學科建設、參與新出土簡帛的整理與研究、推動國内外學者的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已經成爲一個打破單位、地區界限的簡帛研究前沿陣地。這次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持編輯的《簡帛研究文庫》，正是基於以上大的學術背景和新世紀簡帛學科新的發展趨勢，以及我們對簡帛研究的一貫執著精神而進行的。與我們所主持編纂的《簡帛研究》刊物一樣，《文庫》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它將爲海内外不同學科從事簡帛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發

表學術見解的園地，也將爲不同學術觀點的争鳴提供一個平等的陣地。《文庫》的編撰形式多樣，無論是從歷史、考古、語言、科技、藝術、文化的哪個角度，也無論是專著、文集、譯著、辭典，只要是與簡帛研究有密切關係、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嚴謹求實、開拓創新、學風正派的論著，都在我們的收録範圍。《文庫》堅持成熟一部、出版一部的原則，扎扎實實，集腋成裘，數年以後，終將爲簡帛研究、簡帛學科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最後，我們衷心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爲《文庫》的編輯出版提供的無私幫助與真誠合作，感謝海内外學者多年來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由於我們的能力有限，在編纂過程中難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也竭誠歡迎學界朋友提出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

2006 年 3 月

前言

本書所錄係 2008 年 8 月 28、29 日在韓國成均館大學召開的由韓國東亞資料學研究會、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辦的“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以出土資料爲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韓中日三國及中國臺灣的 12 位出土文獻方面的著名學者和 12 位討論者參加了本次學術會議，圍繞上述主題作了精彩的演講和極具深度的討論。中國的陳偉教授(武漢大學)、李均明教授(清華大學)、陳松長教授(湖南大學)，中國臺灣的季旭升教授(玄奘大學)，日本的犬飼隆教授(愛知縣立大學)、平川南教授(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谷中信一教授(日本女子大學)、藤田勝久教授(愛媛大學)，韓國的李鎔賢教授(韓國國立夫餘博物館)以及本書的 3 位韓國編者出席了這次學術會議並發表了各自的論文。出席本次會議的外國學者不僅在古文字、音韻、歷史、哲學思想等方面有著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也十分活躍。在此衷心地感謝與會外國學者抽出寶貴的時間參加本次會议並發表高見。

本次學術會議的問題意識和目標如下：對於東亞文化的研究向來是以文獻資料(傳世文獻)爲中心展開的，但自從 20 世紀以來韓中日三國出土了許多資料，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也隨之逐步深化，因此以出土資料爲中心進行研究也很普遍了。

而說起過往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都有很大的差異。可以說研究是在各地區各領域内分别獨立展開的，而我們也不曾確立一個以文化整體爲對象的綜合性的"資料學"研究方法論。

儘管近三十年來韓國發現的簡牘在數量上還少於中國和日本，但爲瞭解資料十分匱乏的所謂韓國古代及其社會提供了重要線索。特别是在韓國出土的資料的成書年代介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可以說這爲以出土資料爲媒介跨學科地研究先秦至公元 8 世紀的東亞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時機。

另外，通過創建新的研究方法論，廣泛活用資料，加深了對東亞文化的理解。但是，在韓國（乃至在整個世界範圍内），以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資料學"研究領域還未完全成形，因此我們還需對此進行深度討論。

此次會議提出了"資料學"的對象、意義、研究方法論、問題點以及它是否具有正確理解古代東亞文化的媒介的作用等問題，並在古代文學、語言、歷史及哲學思想等領域裏做跨學科的整體性研究，以此來探索"資料學"的可能性，進一步探討出土資料在"資料學"這一更大的領域裏的本質意義，這就是本次會議的最終目的。

爲便於理解，在此簡單介紹一下人文韓國事業和東亞資料學研究會。首先，人文韓國事業團（Humanities Korea Project）是從 2007 年開始由原韓國學術振興財團（2009 年起併入韓國研究財團統合運營）提供財政支援的項目，它的目標是確立以研究所和研究團爲核心的研究體系，培養研究主體，強化研究功能，並對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予以長期支援。2007 年東亞學術院參與到此項目中，並以"疏通和擴散——以東亞研究創新韓國人文"爲精神，以構建具有世界水準的作爲東亞研究據點的核心研究中心（HUB）爲目標。現已進行到第一階段第三個年頭。

爲了系統、有效地實施上述研究計畫，正在組織和運作跨學科的教育研究活動的統合體系，即機關研究的執行主體研究單位（Research-Cluster）。東亞資料學研究會正是其中一員，它成立於 2008 年 3 月。作爲此研究會的下級組織，楚簡輪讀會主管並組織每月數次的資料輪讀、邀請國内外碩學進行講演或召開學術會議、叢書刊行等研究活動和

事業。

作爲研究會名稱使用的“資料學”不僅在國内，在國外也是個比較生疏的概念。仅以韓中日三國的情况而言，韓國和中國至今也幾乎不使用資料學這一概念，只有日本自 90 年代早中期開始，主要從民俗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立場上，使用“文獻資料學”、“歷史民俗資料學”、“中世資料學”、“人文資料學”等用語。2001 年日本愛媛大學設立了“資料學研究會”，從“信息傳達”的角度研究出土資料，並據此探究古代東亞特别是中國和日本古代社會的特點。

如果想要總體客觀地研究東亞社會和文化，必須要對“資料”有深刻的認識，意識到這一點，本研究會導入了“資料學”這一概念。那麽資料學和文獻學(philology)有何差異呢？在學術上定義“資料學”還爲時尚早，它仍處於研究中，不過資料學和文獻學確實存在鮮明的差異。事實上，文獻學的概念和意義也很難定義，東西方各有其不同的認識，使用的主體不同其定義也不同。在西方詞典上將文獻學定義爲研究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所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特别是語言遺產，用其結果創造性地再現此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狀况。與此相比，在東亞，文獻學與訓詁學、考證學、版本學、甚至文獻情報學的概念相融，這更縮小了它的使用範圍。

資料學以文獻學的方法論爲基礎，與文獻學有相通的一面，但本研究會標榜資料學有特别的理由。首先要擺脱東亞各國從一國史的角度按照文史哲等學科分别研究的方法論。最近抬頭的民族優越主義的態度也是要克服的對象之一。因此要認識到東亞各國社會和文化的固有特性和多元性，跨越時代和國界，從總體上把握東亞近代前後的文化交通和擴散過程，以此來闡明“東亞是什麽”的問題，這就是本研究會的一個目標。爲達到這一目標，無論是古代資料或近代資料、國内資料或國外資料、紙上資料或地上資料都可成爲資料學的研究對象。同時，爲瞭解這些資料，無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它們的方法論也都可能成爲資料學的方法論。

以古代東亞出土資料爲例，中國所出的竹簡和木簡等書寫材料，在韓半島也有發現，其形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它是韓半島特有的書寫材料形態，那麽可以通過對韓日兩國古代木簡的比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研究發現它對日本古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在書寫材料的形態、用途、内容方面古代東亞出土資料也各有異同。這些通過文獻資料是無法得知的。由此我們也可以得知資料學的有效性並不是以一國史而是以整個東亞爲研究對象的，從本書所收錄的論文中能更詳細地瞭解到相關狀況。

要把資料學確立爲獨立的學問，所面臨的問題極多。學術會議中談到確立資料學的系統化首先是亟需樹立具體的研究方法論。再者建立將文史哲等各學科融爲一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和基礎，也是當前的課題之一。我們還要面對許多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本書仅是作爲樹立資料學的一個環節，利用古代東亞共同的出土資料，探索它的可能性，希望讀者們對開拓國内新研究領域給予更多的關心和支持。

2010 年 1 月 18 日
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東亞資料學研究會
權仁瀚・金慶浩・李承律

祝辞

祝賀《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一書的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长　卜憲群

前些日子，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金慶浩教授來信，囑我爲《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以下簡稱《探索》）一書的出版寫幾句賀詞。金教授是我的朋友，曾在社科院歷史所做過訪問學者，我也曾去那裏做過學術訪問，並與東亞學術院簽訂了和歷史所學術交流的協定，這一切都使我應當儘快將祝詞送達！客套的話我不想多說，僅就所看到的目錄内容談一點自己的感想。

本書命名的“東亞資料學”實際爲“東亞出土資料學”，更具體的說是以韓中日爲代表的“東亞出土簡牘資料學”。以這樣的形式和名稱來研究東亞地區的出土資料，從方法和體例上來說都應該是一個創新吧！

人類的書寫載體在各民族都有不同的差異，東亞地區在紙的普遍使用之前，主要是簡帛。由於帛的保存比較困難，我們目前發現的主要是以木、竹製成的簡牘。這些簡牘以中國的發現爲主，時間上也以中國簡牘爲早，其總數已達二十多萬枚，字數也達一百多萬。除中國外，韓

國和日本也發現了以簡牘作爲載體的文字資料。

這些簡牘資料在各國古代歷史的研究上都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從戰國至三國時期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意義尤爲顯著。研究這段歷史的各國學者，差不多都把眼光轉到這些方面，或者從事專門的簡帛學研究，或者從中發現各種可爲己所用的資料。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因此而大大往前推進。例如本書所收錄的陳松長先生關於秦郡名的研究，李均明先生關於秦漢文書的研究，陳偉先生關於漢初律令的研究，李承律先生關於出土文字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谷中信一先生關於齊楚文化交流的研究等課題，都是因爲簡牘材料的出現才可能展開的，依靠傳統的文獻材料大都不可能提出這些問題，即使提出也難以有新的進展。當然簡牘資料的意義不僅對於歷史學，在其他許多學科上也都有重要的價值。我對韓日簡牘在韓日學術研究上的價值瞭解不多，僅從本文作者的目錄來看，它們對於語言學、歷史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也是非常高的。因此，本書的出版對推進各國的相關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很有意義。

然而東亞學術院的金慶浩教授對本書的編纂還有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建立以對古代東亞史理解爲中心的 21 世紀的東亞出土文獻“資料學”。這個提法非常新穎。古代的東亞以中國文化爲中心向周邊輻射，影響周邊國家和民族。古代的東亞文化圈也都發現了以簡帛爲主體的出土文獻資料，這爲古代東亞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平臺和交流對話的空間，這個平臺和空間的最好基礎就是達成對“東亞出土文獻資料學”概念的共同理解，並從這個視角開展對古代東亞史的研究。這顯然具有重大意義。我不知道我的這個看法是否符合金教授的本意。

本書的作者我大都比較熟悉，均爲韓中日簡牘學研究的著名專家，我相信本書的出版對推進三國的學術對話和學術交流，促進三國出土文獻及歷史文化的研究發揮出重要意義！

2010 年 1 月 24 日於北京

東亞資料學可能性的有益探索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　陳偉

最近與金慶浩教授通電子郵件，得知《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即將出版。一年多前在金教授任職的成均館大學參加同名國際學術研究會的情形，不禁又清晰地在眼前再現。

2008年8月28—29日，由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辦的"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以出土資料爲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成均館大學召開，韓國學者與來自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的學者、日本學者40多人與會。韓國、中國和日本學者有12人發表論文，論文講評人和其他與會學者對這些論文進行了討論。

簡牘研究由於資料的不斷湧現，從上世紀末開始，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掀起新的研究熱潮。各種相關的學術會議，包括國際會議，也開得比較多。與一般的國際學術會議相比，這次研討會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值得稱道的特點。

第一，會議主題的國際性。研討會以"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爲宗旨，同時把中國、韓國、日本的出土簡牘作爲研究對象，既有對於各國簡牘形制與内容的具體解讀，也有論文著眼於東亞各國出土資料的關聯性，對它們進行總體研究。這大大超出了一般專題會議的限制，使

得與會者可以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中思考和研究問題，探討出土文獻對於東亞歷史研究的意義。

第二，重視對簡牘文獻資料性質的闡發。即從資料學層面對待出土的簡牘資料，分析其與傳世文獻的共性與特性，探討簡牘文獻在傳世文獻研究和以傳世文獻爲基本資料而進行的學術研究之中的特殊意義，醞釀出土文獻資料學的創建。在這方面，日本愛媛大學"資料學研究會"的學者已經作出有益的嘗試。主持這次會議的金慶浩教授對愛媛大學學者的工作表示讚賞，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將這一嘗試推向前進。

第三，與第一點對應，會議安排儘量國際化。大概由於多數與會者的學術背景，會議上使用最多的似乎是漢語。不過，主辦方對每篇發表的論文，除了發表者寫作所用的母語之外，還都提供了另外兩國語言的要旨譯文。各位講評人的評論意見，也如此安排。使得大家對發表者、評論者的意見能夠比較方便地理解、答辯和討論，會議的效率、效果因而得到保證。

韓國成均館大學，是一所有著優良學術傳統和深厚人文底蘊的學校。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的金慶浩和李承律兩位教授，年富力強，分別在中國秦漢簡牘和戰國簡牘的研究領域，作有突出的成果。以他們的學術班底，必定能夠在中國以至東亞簡牘文獻研究中，作出獨特的貢獻。"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功召開和同名論文集的順利出版，乃是一個良好的起步和預兆。

贈　言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　平川南

在中國，文字最初使用於與神的對話中。後來，在皇帝褒賞的金屬和貨幣上刻有各地區的豪族發誓忠誠於王的文字。到了秦代，文字得到了統一，成爲統治的工具。

日本開始使用文字是爲了與中國的外交活動，此後在本國政治上帝王賜給臣下的刀上刻記著銘文。後來地方豪族將拜見王的來龍去脈記錄在刀劍或鏡子上。從文書行政確立的八世紀開始，將食物裝在土器裏獻給神的同時，也把自己的心願用文字方式傳達給了神。雖然全面使用文字的時代並不相同，但可以猜想古代朝鮮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古代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文字流傳方式的不同，可以說明產生文字的國家中國和接受文字的國家日本、朝鮮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雖然到目前爲止，古代朝鮮的出土資料的數量還少於中國和日本，但位於中日兩國中間地帶的古代朝鮮的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古代朝鮮的文字資料，包括音義在內，木簡等的刑制、標記、記載内容等方面的資料不僅有利於古代日本木簡的研究，也是研究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可以說解開日本初期文字文化的神秘面紗的鑰匙就在古代朝鮮。

此次成均館大學在中日之前，召開了以“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爲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並以此整理出書，爲東亞史相關的學術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應給予極高的評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